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f2@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史镜

一封书信免兵戈

□ 陈忠海

汉朝初年，原本向朝廷称臣的南越王赵佗称帝，使国家面临南北分裂的危险，此时汉朝国力尚不雄厚，恢复和发展经济是当时的首要问题，但国家统一又是不容动摇的原则，面对这样的矛盾，汉文帝充分运用政治智慧，制定和实施了正确的决策，最终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国家统一面临挑战

秦朝建立后在岭南地区设立了桂林、南海、象郡等3个郡进行管辖，但秦朝很快陷入战乱，中央政权对岭南地区鞭长莫及。当年远征岭南的秦军中有一个叫赵佗的人，祖籍河北，后来留在了岭南，任南海郡龙川县令，他趁乱掌握了南海郡的实权。

赵佗下令断绝与中原的交通，“绝道聚兵自守”，同时清除郡内仍忠于秦朝的官员，在重要岗位上全部安插心腹，实力增强后又向附近其它地区发起进攻，大约在公元前204年前后吞并了桂林郡和象郡，控制了整个岭南地区。此时中原地区仍在混战，赵佗于是公开称王，自封为“南越武王”，历史上称这个地方割据政权为南越国，其控制范围南至今越南中部，史书称其疆域“东西万余里”。

汉朝建立后南越国继续存在，双方形成了对峙，刘邦很想将其征服，但汉初民生凋敝，无力再兴兵南征，于是派名士陆贾赴岭南，封赵佗为南越王。陆贾向赵佗陈述利害，赵佗接受了汉朝的分封，向汉朝称臣，刘邦命令赵佗“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双方还开通关市发展贸易，这之后，南越在经济上对中原地区的依赖程度很高。

刘邦驾崩后汉惠帝即位，随后吕后称制，掌握了朝廷大权。吕后大约觉得南越国不太服管，双方关系变差，吕后一生气，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金铁田器”指的是铁制、铜制的各种农具，当时岭南地区还无法制造这些先进生产工具，全部从中原地区贸易中取得，这条禁令无疑掐住了南越的脖子。

吕后也许是想拿这些来施压以使赵佗低头就范，但已经当了十多年南越王的赵佗已不再是原先那个小县令，也不是陆贾几句话就能让其乖乖就范的了。赵佗干脆自称“南越武帝”，与汉朝彻底决裂，并发兵攻打与南越相接的长沙郡，占领数县。吕后大怒，派将军周灶讨伐南越，由于地理环境不熟、北方将士不适应岭南气候等原因进展缓慢，而此时吕后驾崩了，刘邦的儿子刘恒即位，周灶率军回师。赵佗既不取消帝号，也不向汉朝朝贡，摆出一副与汉朝“平起平坐”的姿态。

汉文帝的政治智慧

刘恒继位时汉朝国力仍然较为有限，还在休息生养的阶段，同时内部也面临许多挑战，发生过济北王刘兴居叛乱事件，南越成为当时汉文帝手上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如果继续对南越用兵，一来面临军事上的风险，弄不好就会重蹈吕后远征无功的覆辙；二来即使军事上取胜，也会付出巨大代价，对于仍处在百废待兴的汉朝来说也是不划算的事。鉴于此，汉文帝决定改变解决南越问题的策略。

汉文帝了解到，赵佗之所以称帝并攻打长沙郡，是因为他认为吕后听信了长沙王吴芮的谗言，刘邦当年封吴芮为长沙王，将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等5个郡作为其封地，其中有3个郡在赵佗手中，赵佗认为吴芮想拿回封地才挑拨南越与朝廷的关系，赵佗曾分别派内史、中尉、御史等3次赴长安进行申辩，但都被吕后扣压。这些表明，赵佗本意没有蓄意分裂汉朝的打算，让他取消帝号重回汉朝仍有可能。

吕后当初下令毁了赵佗父母的坟墓，汉文帝命人将其重修，每年奉祀，并派人守护，又召见了赵佗留在中原的亲属，任命其官职并厚赐。做完这些，汉文帝又给赵佗写了封信，仍命陆贾送去。

汉文帝让陆贾带去的这封《赐南越王赵佗书》写得很用心也很精彩，历来评价很高。信的一开头写道：“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这句话既摆明双方的地位，奠定原则和基础，同时又亲切、低姿态。紧接着是一句“朕高皇帝侧室之子”，汉文帝知道赵佗对他的父亲刘邦很有好感，所以强调了自己是刘邦的儿子，同时他又是刘邦与薄姬所生，意在强调自己是“侧室之子”，一方面继续低资态；另一方面与吕后划清界限，不让赵佗产生误会。汉文帝在信中还告诉赵佗，他家祖坟已被修护，进一步增进好感。

之后汉文帝笔锋一转，说南越掀起战火以来，双方损失都很大，“长沙苦之，南郡尤甚”，南郡是赵佗的地盘，这句话表面看来是慨叹，也有慰问之意，但其实软中带硬，意思是“杀我八百，你自损一千”。就赵佗关心的长沙王封地问题信里也专门进行了解释，认为那是高祖皇帝很久之前做出的决定，并不刻意针对赵佗，汉文帝向赵佗承诺，只要他接受朝廷的封王，取消帝制，“服领以南，王自治之”。汉文帝还让陆贾带去一些礼物，包括“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以示慰问。

赵佗看到这封信，感动之余也陷入沉思，他是个能洞悉大势的人，与汉朝长期僵持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取消了帝号，重新接受汉朝所封的南越王。还准备了一批贡礼，包括“白璧一双，翠羽千尾，犀十座，紫贝五百，桂壶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派特使赴长安朝贡。

付出小代价达成大目标

赵佗于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去世，按照史书上的说法，他大约活了100多岁，历经汉朝数位皇帝，称帝这场风波过去后赵佗果然信守了他的诺言，至死都为汉朝的藩属，形同诸侯王，使广大岭南地区留在了汉朝的版图之内，维护了国家统一。毛泽东主席曾诙谐地称赵佗为“南下干部第一人”，还说他是“开发岭南第一人”。

这场危机得以化解与陆贾“二使南越”有关，陆贾因此被称为汉朝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但重要的还是汉文帝的正确决策。南越问题很复杂，一味用强或一味示弱都不行，对分寸的拿捏、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把握都要求很高。汉文帝刘恒虽然没有他的孙子汉武帝刘彻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他很务实，也很细心，没有他的高瞻远瞩和周全的安排，南越问题就无法顺利解决。

解决难题离不开对机遇的把握。把握机遇有不同的层次：一是认识机遇，机遇到来时能看到，从而不让它擦肩而过；二是利用机遇，因势利导、趋利避害，让机遇为我所用；三是制造机遇，需要机遇时没有怎么办？那就创造机遇来为我服务。汉文帝从大局着眼定下南越问题的基本策略后，为打破僵持的局面，他耐心细致地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整修赵佗祖坟、任命其亲属为官、精心撰写书信、挑选最合适的人出使等，在没有机遇的情况下创造出了机遇。

汉文帝解决南越问题的启示还有，解决重大的原则问题、棘手问题，不一定必须付出重大代价，在挑战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不失原则，又不能纵一时之忿，要从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出发，充分运用策略技巧、发动政治智慧，只要能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精心谋划，一样可以用小代价达成大目标。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任何谈判或者外交活动都要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作持盾，否则“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能成为一句空谈。汉朝初期国力尚未达到汉武帝时的鼎盛，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济恢复得很快，朝廷实行低税率，百姓生活大为改善，汉朝的软、硬实力都在迅速增长，这才是汉文帝真正的底气，也是让赵佗甘心称臣的前提。汉文帝继位之初就以较小代价顺利解决了南越问题，为和平发展赢得了时间，文景之时汉朝的发展速度很快。想想看，如果汉文帝像吕后那样因一时之怒就大起刀兵，那“文景之治”也许就不可能出现了。

科技史话

鼠标五十载

□ 吕宇珺

1963年，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的斯坦福研究院内，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在同事比尔·英格利希的协助下，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款鼠标。这是一只笨重的木头盒子，盒内装了互相垂直的两只轮子，两只轮子的滚动路径可变为垂直两轴上的运动轨迹。由于盒子的尾部连有一根绳子，整个装置就像是一只老鼠，因此两人便给新设备取名“鼠标(mouse)”。

恩格尔巴特没能想到鼠标后来竟会如此流行，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更没想到这种流行居然会持续数十载之久，从五十年前笨重的木头盒子，到今天轻盈的苹果“神奇鼠标”，在这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电子产品飞速更替的年代，鼠标依然存在于我们的视野中。

恩格尔巴特的女儿克里斯蒂娜说她父亲对于许多科技发展都有正确的预测，而唯独对于自己发明的鼠标，却完全没料到它会存在如此之久。“他总是觉得肯定会有新的探索计算机的方式出现。”

1968年，德国公司德律风根研究并发布了一款鼠标，与恩格尔巴特设计的鼠标不同，这款鼠标底部含有一个滚动球，这便是最早的滚动型鼠标。从1970年开始，这款鼠标便成为德律风根牌电脑的标配。此后，也有其他电脑配备了鼠标，但直到1984年苹果公司的第一代Mac电脑登台，鼠标才迎来了它的黄金年代。第一代Mac电脑配备了升级版的Lisa鼠标。此前不久，微软也为了让用户操作word时更加方便，推出了首款与PC机兼容的鼠标。

此时的滚动型鼠标属于机械鼠标，可朝所有方向滚动的滚动球替代了此前的两只垂直方向的轮子。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滚动型鼠标几乎成了所有电脑的标配。好多人最早接触计算机的记忆都离不开这样一个滚动型鼠标和一个鼠标垫。

随着科技的进步，光学鼠标乃至激光鼠标的推出，鼠标的操作体验变得越来越舒适，鼠标垫也逐渐被淘汰，变得不那么必须了。而以无线鼠标为代表的各种无线电脑配件的发明更是把人们从桌面上众多“缠绵徘恻”的“线团”中解救出来。

鼠标自身不断革新的同时，恩格尔巴特认为的新的探索计算机的方式正悄然占据市场。在触摸板、触摸屏、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的一波波冲击下，办公室内早已像空气一般存在的鼠标点击声似乎在渐渐淡去。在这个后PC时代，恩格尔巴特数十年前认为的更替终于发生了：“点击时代”正在离去，“触摸时代”已强势来临。

以IOS系统和Android系统为代表的智能手机和平板时代早已到来，而微软也紧随其后，推出了面向触摸屏的windows系统和surface平板。无论是智能手机还是平板电脑，最大的特点之一便是高灵敏度的多点触摸技术。

当轻轻地触碰屏幕便可自如完成选择、放大、缩小等操作时，当年只能在诸如《少数派报告》等片子中对着镜头想象的人们，今天终于能亲身体验。而鼠标之父恩格尔巴特的两个20岁出头的外孙也已不再使用鼠标了。

如果说上了年纪的人们对于“点击时代”还存在怀旧或者依赖，那么“零零后”们可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迈入“触摸时代”。10岁美国小朋友约瑟芬·阮说她只用过一次鼠标，“感觉太慢了”，她不喜欢鼠标的体验。正在上五年级的阮喜欢在iPad上查单词，她的20个同班同学和她一样。而6岁的吉伯·瓦斯奎兹更是从没听说过这个跟老鼠名字一样的东西。美国的幼儿园及中小学逐渐发现iPad对于教学的辅助作用，根据投资研究公司Needham&Co研究人员查尔斯·沃尔夫的调查，今年秋季学校采购的iPad超过PC机。

而YouTube上一段高点击率的视频更是说明了“触摸”在孩子们心中已深深扎根。视频上一名还不怎么会走路的婴儿拼命地在一本时尚杂志上滑动手指，“对于我1岁的女儿来说，一本杂志看起来就是台坏掉的iPad”，视频的上传者在视频结尾处说道。

鼠标走过了半个世纪，它还走得动吗？

（原载2012年第12期《看历史》）

国外的奇怪节日

俄罗斯坦波夫地区的人与甜菜情深意长，在每年10月7日举行甜菜节。大家载歌载舞，到甜菜园里参加义务劳动，并举行以甜菜为主食的丰盛晚宴。

非洲尼日利亚每年6至7月全国都在同一天庆祝马铃薯节。人们杀鸡宰羊，以马铃薯为主食款待宾客，并举办各种与马铃薯有关的娱乐活动。

西班牙不少城市每年6月都要举行一次为大蒜唱“颂歌”的活动，家家户户以大蒜为佐料制成各种美食，相互馈赠。入夜，大家一起联欢。

摩洛哥北部塞夫鲁镇，在每年6月中旬，举行为期三天的樱桃节。节日期间有樱桃展览、歌舞晚会及体育比赛等活动。最后，竞选“樱桃皇后”和“樱桃公主”，把节日活动推向高潮。这里的樱桃节始于1920年。

（原载2016年第12期《文史天地》）

一个纠缠千年的文化心理公案

□ 杨念群

京派海派之争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和上海文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一次对骂，被称为“京派”与“海派”之争，这段公案最初仅限于讨论作家的写作风格，后来延伸到对京沪两地文人行为和气质的评价。论争的发难者沈从文在《论“海派”》一文中概括海派的特征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用尖刻的语气大损海派是一帮新斯文人，说他们如名士相聚一堂，吟诗论文，冒充风雅，或远谈希腊罗马，或近谈文士女人，行为与扶乩猜诗谜者相差一间。

又有一个评价是：“海派有江湖气、流氓气、娼妓气；京派则有遗老气、绅士气、古物商人气。”矛头直指京派领袖周作人。周作人则直接回应“上海气”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格”。当然还是大先生的话一锤定音，说是“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不过，这些议论都把自己圈在了北京、上海两个城市里比较，实际上，京派海派之争背后所隐匿着的南北文化差异才是更有意思的话题。

宋代就有重南轻北的习惯

南人和北人相互看不起不知始于何时，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宋代就有重南轻北的习惯。宋人是出了名的尚文轻武，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夺了军人带兵的念想后，文人领军成了时髦风尚，连皇帝都纷纷把自己装扮成高级文化人。与此相对应，宋朝军人与北方蛮族交战就经常显得柔若无骨，不堪一击，听杨家将的故事，我们常常误以为北宋已经靠寡妇在打仗。

有一位华裔美国史学家形容宋代的气质内敛封闭，面对北方金人的狰狞强霸，像个柔媚害羞的女子。仔细想，这“害羞论”还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不但宋代文人气质儒雅，皇帝脾气也好得不行。传言某个北宋皇帝和某个丞相整日勾肩搭背，有说不完的知心话，这位丞相爷更大言不惭地说要和皇帝“共治天下”。有些皇帝姿态谦卑低下，常请一些没功名的布衣文人到宫中做客，在殿上听其娓娓清谈，搞得一些文人得意忘形地说要“格君心”，做皇帝的思想辅导员。只不过当时文人再得势，也无法遮掩宋军一败再败的现状，一种奇怪的心理补偿论才逐渐流行起来。这种怪论把辽金人想象成没有文化品位的种族，只会在马背上打仗撒野，一旦遭遇大宋的文明气象，外表虽硬充好汉，心里却矮了三分。这论调故意严格划分汉族和北方民族的界限，两相比较，贵贱分明，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汉人血统的纯粹高贵。

“心理补偿论”特别容易在朝代更迭的过渡期频频发作，比如宋元之际和明清之际就是如此。由于宋代之后南北军事形势被彻底逆转，汉族王朝在对北方少数族群的征战中从没占到过什么便宜，江山一旦易主变色，南方文人彻底屈从在北方蛮族手下讨生活，用文化优越的心理去补偿国土丧失之痛就变成了不得已的选择。清初残留下来的明朝遗民尤其不相信“命定论”。“命定论”是清初流行的一种说法，认为帝王多定都北方，所以凡能统一天下者都是自北而南，顺势而下，地气生成蔓延也是如此；相反，天下动乱的发生多是由南向北，因为南方地气柔弱，北方风气骠劲。清初皇帝如康熙就特别喜欢这种“地气论”，他说，金陵虽凭借长江天险，却地脉单薄，所以凡是建立在南方的政权总是逃不脱偏安的命运，成不了大事，他暗讽的当然是南宋和南明这类建立在江南的小朝廷。这与南方文人的想法显然南辕北辙。

“南胜于北”的思维根深蒂固

宋人心理补偿论引发的南人优越感一直延续至近代，突出的一个例子是革命党人还是利用宋人那一套说法来做助推革命的燃料。刘师培就用典型的宋人语言描述南北分立的历史态势，如说“金元宅夏，文藻黯然”，金元是异族统治的朝代，代表北方势力，自然压抑住了南方优雅的文明，这太像宋人的语气。又如以下这段：“及五胡构乱，元魏凭陵，虏马南来，胡氛暗天，河北关中沦为左衽，积时既久，民习于夷，而中原甲姓避乱南迁，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流风所被，文化日滋。”大意是说中原原来是文明的核心，让北方胡人污染后，文明人才纷纷南迁，造成南方文化远胜于北方的局面。

这种“南胜于北”的思维根深蒂固，即使表面上讥讽南人奢靡，处处小家子气，也远胜于北人的粗野不文。刘师培比较南北文人的差异说是：“大抵北人之文，猥琐铺叙以为平通，故朴而不文；南人之文，诘屈雕琢以为奇丽，故华而不实。”这种对北人的贬词好像带着些许醋意，对南人文辞雕饰的批评也似乎显得言不由衷。

革命党人想打出反满的旗帜，也是沿了宋人的思维一路走下来，否则革命似乎缺少合法性。比如朱谦之就强调广东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因为它是中国“科学”和“革命”的策源地。近代以前，人们总是把广东想象成未开化的南蛮之地，经朱谦之一点拨，广东不但摇身一变成为吸纳近代科学文明的重要入口，而且也是推翻北方蛮夷出身的清朝统治的发轫之地，真可谓是宋人自恋的近代极致版。

南人北人的区隔在近代被虚化

近代以来，为南人说话的人占据大多数，敢为北人说话者不是没有，但并不多见。也偶有例外，如2012年正逢清帝逊位一百周年，还真寥寥出现过几声异辞的鸣响，与前一年的辛亥革命热唱了点反调。有人说，革命党单靠潜伏于南方草根的秘密会社闹起事来，有点像当年高调反清复明的天地会，要不是北人袁世凯逼使满人皇帝光荣退位，就靠这几个会党作乱掀不起什么大浪。袁氏虽心狠手辣，却在形式上承接了清帝禅让的大统。这番话一出炉，明摆着是想和南人抢夺首倡革命的风头，遭遇围攻当属意料之中，却毕竟为早已被后人念歪的“重南轻北论”制造出一点异样的动静。

即使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南北文人的写作风格也相互交融互渗。就如京派领军人物沈从文也是从湘西土匪窝子里爬出，浑身带着南蛮的粗鄙闯到京城，哪里有什么帝都遗老的气质，故一直自称是城里的“乡下人”。但文字又是那般水润，有南国的媚气。他会说写字如同造一座希腊小庙，“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这种相当小资的语气中哪里还荡漾着湘匪的蛮横？也看不出和帝都绅士有什么瓜葛。

可见，南人和北人的区隔在近代已经被虚化了，虽然有宋人唠叨的阴影在，毕竟随着时代的进展渐渐抹平了心理的计算和纠葛。

（原载2016年9月5日《北京日报》）

有所思